

# 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在思想领域 拨乱反正的经验及启示

——以邓小平 1977—1978 年系列讲话为例

□ 谢文雄

提要：邓小平 1977 至 1978 年间，在不同场合发表了大量讲话，其主要目的是在思想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中心是如何正确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由于这些讲话深入浅出，生动形象，而且很好地和人民群众当时的工作、生活紧密相连，从而迅速地重新确立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即将到来的工作重心转移、实行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并为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思想领域 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理论 实事求是 拨乱反正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看到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给当时中国思想领域的拨乱反正所形成的深刻影响，而忽略了邓小平在 1977 至 1978 年间的系列讲话，对当时的中国社会尤其是理论界形成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邓小平在这一期间的系列讲话，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内涵，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在思想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为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正确评价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并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创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同时也为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 一、要求把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内涵，在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以毛

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出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相应地，马列主义也为广大党员干部以及人民群众所普遍接受。但是，进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后，马列主义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被庸俗化的倾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发展成为“教条”，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粉碎“四人帮”之后，邓小平认识到：当时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纠正人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认识，使人们在理论指导和思想认识上重回正确的轨道。为此，他就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发表的一系列谈话，要求人们在把握马列主义理论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防止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在思想文化领域拨乱反正。

关于实事求是。1978 年 5 月 30 日，邓小平在与胡乔木等谈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时

谢文雄，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征集二处副处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080）。

指出：实事求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并认为：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sup>①</sup> 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指出：“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sup>②</sup> 并指出：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按照实际情况解决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了”。并谈到了“破”与“立”的问题。<sup>③</sup> 1978年6月23日，在会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时指出：毛主席历来主张自力更生，但不排斥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毛主席历来提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洋为中用是自力更生的一个重要内容。还说：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这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原则。解决任何问题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科学的、老老实实的态度，一点弄虚作假也不行，事物的本来面目用语言是改变不了的。<sup>④</sup>

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1978年5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马达加斯加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提出：“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sup>⑤</sup> 1978年9月16日，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等汇报时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

生活的改善上。如果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sup>⑥</sup> 6月23日，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总要通过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体现，这是最起码的标准，空头政治不行。<sup>⑦</sup> 1978年9月18日，在鞍山视察时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sup>⑧</sup>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以及如何评价毛泽东。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sup>⑨</sup> 不久，他又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sup>⑩</sup> 7月16日至21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思想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sup>⑪</sup>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在谈到如何对待“两个凡是”时，他进一步指出：“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在谈到毛泽东错误时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并指出：能否正确对待个人的错误，“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并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sup>⑫</sup> 1978年10月3日，在同胡乔木等谈对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问题时说：“领袖”这个词，中国人把它神化了。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sup>⑬</sup>

<sup>⑬</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135-136、141-142、167-168、141-142、171、176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114、111页。

<sup>⑨⑩⑪⑫</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60、162、157页。

1978年11月27日,就评价毛泽东问题指出:毛主席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我们不能要求伟大领袖、伟大人物、思想家没有缺点错误,那样要求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sup>①</sup>

## 二、运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入耳入脑的大众话语,使马列主义真正为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和掌握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载体,语言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人出生以后,就相对稳定地处于某种特定的语言环境之中,如果这一时期足够长,他就掌握了该种语言。与此同时,他也不知不觉中受到这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以及隐藏其中的传统思想的熏陶。“因为特定的‘传统’正是存在于特定的语言之中。”<sup>②</sup>换句话说,人使用语言的过程,实际上是被该种语言所传递的传统所占有的同化的过程:“围绕着我们,是作为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语言,即言谈的世界。生活在语言中,意味着在谈论某事和在与某人谈话中被推动着。”<sup>③</sup>对一般的普罗大众而言,与其通过晦涩的语言来进行说教,不如对他们旗帜鲜明地直接亮明理论的观点和论据。如果强迫他们深入学习一篇长篇大论的文章,不仅可能起不到正面作用,反而极易引起他们的反感,其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不仅是文风问题,更是思想方法问题。”<sup>④</sup>邓小平系列讲话所使用的语言风格,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的这一需要。

让历史告诉未来。1978年7月9日,在会见美国国会议员团时指出:过去曾有两次国共合作,难道第三次不可以谈?第二次合作是在十年内战之后。这证明中国人民面临共同的民族问题时,是可以走到一块的,中国人之间自己会找到一个实现祖国统一的途径,其中包括在解决方式上尊重台湾的现实。<sup>⑤</sup>

语言生动形象。1978年7月,在会见美国科技代表团时指出:“(‘四人帮’)把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成果,说成是‘崇洋媚外’。他们吹嘘自己长得很漂亮,怕丢丑。我们这么落后,面孔本来就不漂亮,你吹嘘干什么。我们现在需要向发达国家,包括你们学

习。”<sup>⑥</sup>并指出,将来我们发展了,“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国籍’。肯定就是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sup>⑦</sup>。1978年8月1日至2日,在听取第七机械工业部负责人宋任穷、郑天翔、王纯等汇报工作时指出:揭批“四人帮”运动不能拖得太久。对有错误的干部要做结论,给纪律处分。对“火箭式”上来的干部要“卫星回收”,让他回原单位。<sup>⑧</sup>1978年10月14日,邓小平指出:要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真正做到三不主义,要改变那种看气候、看风向说话的倾向。我们还是要像大庆那样,提倡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sup>⑨</sup>1978年9月17日,就军队如何搞好揭批林彪、“四人帮”,提出了五条要求,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点了一把火。<sup>⑩</sup>让人印象深刻。

讲话言简意赅。1978年5月21日,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时,指出:在这个(台湾)问题上,我们历来阐明的就是三项条件,即断交、撤军、废约,这三项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sup>⑪</sup>1978年7月11日,在听取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张才干、徐立清和总后勤部副部长李元关于全国民兵工作会议筹备情况的汇报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一句话,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恢复老传统。<sup>⑫</sup>7月22日,在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谈话时,明确肯定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sup>⑬</sup>有一次,邓小平谈到在理论队伍中应提倡和实行民主作风问题时指出:这个问题很重要。毛主席讲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辩证法嘛,不“辩”怎么能“证”呢?经过“辩”才能“证”。<sup>⑭</sup>

例子生动形象。1978年9月16日,在听完王恩茂等汇报后,为了阐明“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因此,要“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来

<sup>①⑩⑪⑫⑬</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5、147、147-148、127-128、152、182、169、130、148、150页。

郭建宁主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前沿问题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82页。

[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4页。

李梅丽、刘华、乔中国:《群众视角: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关键》,《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第6期。

<sup>⑭</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一个革命”这一命题，他举例说：“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实事求是很简单，不是一个小问题，所有人开动脑筋，就有希望。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就永远陷于落后不行”。<sup>①</sup> 1978年9月20日，在听取中共天津市委负责人林乎加等汇报时，再一次就“开动机器”问题指出：我走了几个地方，一再讲要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要从实际出发。我们过去是吃“大锅饭”，鼓励懒汉，包括思想懒汉，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sup>②</sup> 1978年9月17日，在听取中共辽宁省委负责人曾昭山等人的汇报时指出：要开动脑筋，不开动脑筋，就没有实事求是，不开动脑筋，就不能分析自己的情况，就不能从实际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并举了学大庆和学大寨两个例子。<sup>③</sup>

逐步凝聚共识。粉碎“四人帮”后，人们由于经历过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尽管认识到要在实际工作中转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但是在思想上还一下子想不开，脱离不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如前所述，邓小平在一系列讲话中慢慢引导，多次阐述，最终使大家形成共识，也就是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那篇著名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sup>④</sup>

### 三、紧密结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 紧扣时代脉搏，回答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

一种理论在意识形态上指导地位的确立，不能靠简单的理论论证，根本的途径在于其运用于实践后产生的效果。要培养受众对理论的正向情感，就必须在现实中关注他们的利益和诉求，解决他们关心的社会问题。<sup>⑤</sup>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证明是唯一适用于中国的科学理论，这已为社会各界所承认。邓小平系列讲话紧扣时代脉搏，关注人民日常工作和生活，在现实中，也确实解决了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问题，从而使广大人民群众纠正了对马列主义尤其是毛泽东

思想的错误认识。

指导教育和科技界的拨乱反正。1977年5月24日，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提出，“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来之后，就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可以给津贴补助”，并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sup>⑥</sup> 7月23日，他强调：“对技术人员，只要努力钻研技术，在技术上有贡献的，就应支持。”<sup>⑦</sup> 7月27日，在同方毅、李昌谈科研工作时指出：“要把有作为的科技工作者列出名单，填出表格。对这些人要给予适当照顾”，“科研人员的房子问题、两地分居问题要逐步解决”。<sup>⑧</sup> 8月6日，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根据与会者的建议，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9月19日，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强调，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辞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sup>⑨</sup> 随后不久，就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并恢复了高考，使广大知识青年和科技工作者有了充分的用武之地，受到他们的衷心欢迎。

要求恢复按劳分配制度。1977年8月3日，在谈起起草党的十一大讲话稿等问题时指出：“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sup>⑩</sup> 9月6日，在会见美联社董事会代表团时强调：“所谓按劳分配，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群众反对‘四人帮’，主要是反对他们不让劳动，不让提高劳动生产率，不鼓励劳动有贡献的人，不让他们多收入一点，不让那些在艰苦劳动条件下劳动的人多收入一点。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sup>⑪</sup> 11月17日，邓小平要求对“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指出“说什么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这样的规定要批评，要指出这是错误的”，强调“要采取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按劳分配制度”。<sup>⑫</sup> 1978年3月28日，同胡乔木等谈按劳分配问题时强调：“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sup>⑬</sup> 按劳分配制度的恢复以及配套规章的建立，满足了人们致

<sup>①⑩⑪⑫</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172、169、205、51、55、55-56、74、58、70-71、92-94页。

徐家林：《受众的情感取向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分析》，《探索》，2010年第5期。

<sup>⑬</sup>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富的欲望，同时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致力于恢复和完善、改进侨务政策。1977年9月29日，在会见到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时指出：“现在，侨务工作提到日程上来了，准备恢复过去的侨务机构。”关于国籍的问题，“鼓励他们加入所在国的国籍，但也不能强迫”。对那些不愿意加入的人，“祖国有责任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侨务工作就是“要把爱国人士、民主人士、宗教人士等等更好地团结起来”。<sup>①</sup>并强调：“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的统一战线。”<sup>②</sup>10月2日，他进一步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这种说法是反动的”，“对愿意出去的人，不要搞得那么紧，继承遗产、娶亲等等，都可以出去。回来的也欢迎”。<sup>③</sup>1978年11月5日至14日，在访问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时，邓小平重申了在侨务工作上有关“国籍”的原则立场。邓小平有关侨务工作的讲话，解决了华侨、华人不能到中国探望亲属，也不能互相通信的难题，在国内涉及到的人数就达几千万。

邓小平不仅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传达给了中国的各个阶层，而且使他们认识到，在这些理论指导下的具体实践中，他们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并解决涉及到他们面临的切身问题，如温饱、就业等，从而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仍然迅速在中国社会中重新获得了指导地位。

#### 四、现实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sup>④</sup>

改革开放前夕，邓小平在思想文化领域初步实现了拨乱反正的目的，为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其成功的历史经验，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借鉴。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5000多年连绵不绝的文明历史，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sup>⑤</sup>因此，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既存在相通的地方（精神内核），也不乏碰撞与冲突（主要体现在外在表现形式）。“要卓有成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走近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具有中华民族的形式和风格，必须充分认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与特点，并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的情感与心理特征。”<sup>⑥</sup>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真正植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并成为普通百姓及整个社会的指导理论。

第二，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耳熟能详的事例，生动地阐述其深刻含义。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sup>⑦</sup>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灌输”和“引导”等多种方式，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目的是要为他们所认知、接受并最终成为日常工作生活的思想指南。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现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并乐于接受的内容，再通过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样才能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从而把“被动地、自发地”行为转化为“主动地、自觉地”行为。

责任编辑：凌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编（一九七五——一九九七）》，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9-80、80、80-81页。

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求是》，2013年第1期。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3月18日。

李群山：《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民族文化视角与路径选择——兼论毛泽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经验》，《求实》，2013年第3期。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